

关于哥巴文字源考证的几点看法

——读《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

喻遂生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本文对黄振华先生《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哥巴字的造字基础是汉字”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音读和训读的确定应根据哥巴文字符的实际音义, 没有音读或训读两可的情况, 亲属语言在哥巴文字源考证中没有太大的证明作用, 哥巴文字源考证应充分重视哥巴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东巴文和哥巴文的内在联系及哥巴文在经典中的运用情况。

关键词: 哥巴文; 字源; 考证

中图分类号: H257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关于哥巴文字符的来源, 李霖灿、方国瑜、和志武、李静生、毛远明、曹萱等前辈时贤做过不少的研究¹, 基本的看法是有来源于东巴文、借用汉字、借用藏文、新造字符等几种情况。近年黄振华先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近 4 万字的长篇论文《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以下简称“黄文”), 列举 277 例, 考证了《纳西象形文字谱》中近 400 个哥巴文字符的来源, 认为, “现在已知的 500~600 个哥巴字(包括异体字在内)便有半数以上可以判明出自借用汉字增损笔画而加以音读或训读, 表明纳西族文化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旧说哥巴字是在东巴象形文字的基础上, 受藏文和老彝文的影响所创制而成, 显然是不确切的”(272 页), “换言之, 哥巴字的造字基础是汉字, 而不是藏字和彝字”(274 页)²。

黄文列举的 277 例中, 判定为“训读”的 230 例, 判定为“音读或训读”的 47 例。其中除例二七六由卦象训读、例二七七由象形(引按, 指东巴文)训读外, 其余 275 例, 都来源于汉字。黄文考证哥巴文字源的基本方法是, 选取一个和哥巴文字符相近的汉字, 根据其形似而说“显见”是“借用汉字”而“训读”或“音读或训读”, 然后举若干亲属语言的音义作为旁证。例如:

例十九——哥巴字“𐄎”音 ny, 显见借用汉字“反”而改形训读。可比较藏语 ŋo-, 门巴语 ŋo-, 珞巴语 ŋo-, 木雅语 ŋø-, 扎巴语 ŋo-, 却域语 ŋo-, 道孚语 ŋo-, 景颇语 niŋ-, 拉祜语-na, 吕苏语 ŋe-, 独龙语 nuŋ-等, 其义皆为“反”。

例二十——哥巴字“𐄎、𐄏”音 su, 显见也是借用汉字“反”而改形训读。可比较哈尼语 se-, 彝语-sɿ ʂɿ、-zi, 藏语-ʑeʔ, 却域语zi-等, 其义皆为“反”。字形比较见上例。

例二十一——哥巴字“𐄐”音 biə, 显见也是借用汉字“反”而改形训读。可比较纳西语-phv, 彝语 pho、phu, 哈尼语-pu, 藏语 pha-, 嘉戎语 phi-, 扎巴语-pho, 吕苏语-phu, 独龙语 paŋ, 仙岛语 phet, 载瓦语 phuʔ, 浪速语 phauʔ, 波拉语 phauʔ等, 其义皆为“反”。字形比较见上例。

例四十八——哥巴字“𐄑”音 sər, 显见借用汉字“少”而改形音读或训读。可比较白语

cu, 哈尼语ɬɔ, 彝语 su、-ci, 载瓦语ɬau, 浪速语ɬau, 波拉语ɬau, 勒期语ɬa: u 语等, 其义皆为“少”。

例一一二——哥巴字“𠂔”音 zo, 显见借用汉字“𠂔(集)”而改形音读或训读。可比较彝语 tci-、dze、zu, 哈尼语 dzo、tci-, 基诺语 tci-、tshu-, 白语 tci-, 普米语-dzau, 藏语 tsho, 门巴语 dzom-, 羌语-tɕɛ, 道孚语 tci-, 却域语-dzo, 扎巴语 tɕe dzɿ, 木雅语-tsho, 贵琼语-tɕhi dzui, 史兴语-dzu, 吕苏语-dzu, 景颇语 tɕa-, 珞巴语-tsu, 载瓦语 tsɿŋ, 勒期语 tsəŋ 等, 其义皆为“积聚”。

例二二四——哥巴字“𠂔”音 phui, 显见借用汉字“北”而改形音读或训读。可比较白语 pu, 土家语 putɕ, 哈尼语 pe, 彝语 be phia、bu dzi, 羌语 pe, 藏语 bjaŋ, 嘉戎语 pjaŋ, 道孚语 bjoŋ, 却域语 pɕo, 怒语 tci bu, 阿昌语 pəʔ, 贵琼语 pe 等, 其义皆为“北”。

例二二五——哥巴字“𠂔”音 gæ, 显见也是借用汉字“北”而改形训读。可比较纳西语 gə ly、xo gv lo, 彝语 khɔ, 白语 qo me^f 等, 其义皆为“北”。字形比较见上例。

黄文在排比哥巴文字形和藏缅语同源词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但在反复拜读以后, 我们觉得文中的考释大多数还是难以成立, 其考释方法也还值得商榷。下面提出我们的粗浅看法, 请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二、关于音读和训读

1、音读和训读的判定

所谓“音读”, 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借入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文字符号后, 按照被借字符原来的读音来读音, 而不考虑被借字符原来的意义, 如日文汉字中的“吴音”、“汉音”、“唐音”。所谓“训读”, 是指借入字符后, 按照被借字符原来的意义用借入语言(或方言)相应词语的读音来读音, 而不考虑被借字符原来的读音。如重庆话本无“凹 ao⁵⁵”这个词, 不少人就将“凹”字读成与“凹”同义的“窝 uo⁵⁵”。

在哥巴文中, 确实有借用汉字而音读或训读的。如:

𠂔, 借汉语“上”字, 音读为 ɕə, 可表示 ɕə²¹沙、ɕə³³伤、ɕə⁵⁵说等。

𠂔, 借汉语“止”字, 音读为 tɕɿ, 可表示 tɕɿ²¹粮食、tɕɿ³³土、tɕɿ⁵⁵筛等。

𠂔, 借汉语“犬”字, 训读为 khu³³狗。

𠂔, 借汉语“石”字, 训读为 lv³³石头。

判定音读的标准是音同音近, 判定训读的标准是义同义近, 但黄文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如:

例一一二哥巴字 𠂔 音 zo, 和汉字“𠂔(集)”的现代音 tci、中古音 dziəp 相去甚远, 怎么能说 𠂔 是汉字“𠂔”的音读呢?

例四十八哥巴字 𠂔 sər 和汉字“少”的字形相近, 但纳西语“少”读 nu³³而不读 sər, 怎么能说 𠂔 是汉字“少”的训读呢?

这类例子在黄文中比比皆是, 不胜枚举。黄文中还有一个汉字训读为多种读音的。如说例十九 𠂔 ny、例二十 𠂔 su 都是汉字“反”的训读, 而纳西语 ny、su 并无反义。更有多至十多种读音的, 如说例一四九 𠂔 thv (黄文误作 tv)、一五〇 𠂔 thi、一五一 𠂔 pi、𠂔 phi、一五二 𠂔、𠂔 phu、一五三 𠂔 bə、一五四 𠂔 bi、一五五 𠂔 phy、一五六 𠂔 me、一五七 𠂔 kə、𠂔 gə、

一五八  hy、一五九  zæ、一六〇  si 都是汉字“网”的训读，实际上纳西语网读 ci^{33} ，又读 væ^{33} （当是汉语借词），怎么可能训读出那么多与之不相干的音来呢？

2、有没有“音读或训读”

音读和训读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读法。一个字符的某一个读音，不可能既是音读，又是训读；也不可能任在两读中任意选择，说或是音读，或是训读。纳西族有时用汉字来记录纳西语，用是否加圈来区别训读和音读，二者区分得十分清楚。以下是丽江县黄山乡 1993 年的一篇祭文中的两句及其标音和字释：

⊙子 ⊙吕土

$\text{tʂhua}^{55} \text{ts}_1^{21} \text{tʂhua}^{55} \text{ly}^{33} \text{thv}^{33}$

六 星 六 个 出

⊙ ⊕ 库老体

$\text{tʂhua}^{55} \text{tʂhər}^{21} \text{khv}^{55} \text{lo}^{21} \text{thur}^{33}$

六 十 年 里 头

加圈的为训读，不带圈的字为音读，如“六”、“十”读作纳西语相应的词 tʂhua^{55} 、 tʂhər^{21} ，其他的汉字则按相同或相近的音记录纳西语词，汉语意为“六个星星出，六十年里头”³。

特殊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音义兼借的，如哥巴字  khu^{33} ，意为嘴。纳西语嘴有 nv^{55} 、 khu^{33} 等读法， khu^{33} 当是汉语借词。借词当然是音义兼近，说是音读未尝不可，但说不上训读，因不是按借入语言的固有词来读音。犹如汉字中夹用英文“ok”，是说不上音读还是训读的。二是读此音为音读，读彼音为训读。如哥巴文  读 bu^{21} 山坡时是训读，又读 tʂhy ，表顺从 tʂhy^{21} 、宗族 tʂhy^{33} 等义，为音读。哥巴文同形而异音的字符不少，这主要是因为各地东巴分头造字，互不相谋，而又没有经过“书同文”的规范化而造成的，甚至可以说，很多同形字符并不在同一个体系之内。黄文的“音读或训读”是就一个读音、一个意义来说的，如说例一一二  音 zo ，义为积聚，是“音读或训读”，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3、借形而非音读、训读

李霖灿先生在《论么些经典之版本》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记得中央博物院曾从史图博博士那里买到了一批海南岛黎人的民族学标本，织布用的板子上雕刻出极美丽的几何形的图案花纹，使我们哭笑不得是在图案当中还有很清楚的汉字，这些大字写的竟是‘男盗女娼’。黎人仰慕汉人的文化，请汉人给他们写几个汉字，这些文人就欺负黎人不识汉字，狡猾地把骂人的话写上去，黎人还以为这是歌颂赞美的话，好好刻出来以备子子孙孙永宝藏之呢！所以我们知道，不通某一种语文，那这项材料是没法利用的，把汉人菜单及不准退还字样绣在衣裙上作装饰例子的在欧洲数见不鲜。”⁴撇开故事中民族歧视的因素，可以看出，一个符号系统在借入另外一个符号系统的符号时，有时候没有考虑其音义。哥巴文借用的有些汉字字符，是只借字形，而既非音读，又非训读。如  bæ 、 to 、 the 、 lv 、 ə 、 v ，音义都与汉字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在白文、壮文中也不少，如白文的“丘 xu^{31} （里面）、艮 ni^{21} （人）”，壮文的“兰 yo^{42} （知道）、勺 jak^{55} （将要）、护 dau^{24} （里面）”⁵。

另外，有的哥巴文字符，特别是简单笔画的哥巴文字符，虽和汉字相似，如  pu 、 biə 、 tər 、 tha ，很可能只是偶合，不一定是借用的汉字。

4、亲属语言在字源考证中的证明力

黄文每例下都举了很多亲属语言的材料，看起来似乎证据充分有力，很容易使人迷惑。实际上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特别是结合哥巴文的具体情况，亲属语言的音义，未必对哥巴文的字源有什么证明作用。

若哥巴文有某音、某义，亲属语言也有某音、某义，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旁证作用。但既然哥巴文有此音、义，不举亲属语言，哥巴文的音读、训读也能成立。如  读 tʂ_1^{21} 表粮食为音读， 读

khur³³表狗为训读；又如方块白文“脑”读 nɔ³¹（你）、“波”读 po⁵⁵（他的）、“娘”读 na⁵⁵（咱们）为音读，“话”读 to²¹（话）、“上”读 to³³（上边）、“蝉”读 ta²¹pi²¹（蝉）为训读，方块壮文“猛”读 meŋ³⁵（辫子）、“斗”读 tau⁵⁵（来）、“匹”读 pit⁵⁵（鸭子）为音读，“黑”读 dam²⁴（黑）、“虎”读 kuk⁵⁵（虎）、“走”读 pja:i⁵⁵（走）为训读⁶，这些大概不需要用亲属语言来证明吧。反之，若哥巴文无此音、义，即使亲属语言有之，也不能证明哥巴文有此音读、训读。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哥巴文原来有此音义，只是由于语言演变而消失了，但还保留在亲属语言中，所以亲属语言可以起证明的作用。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哥巴文产生在前，纳西语和亲属语言的分化在后，而这个前提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哥巴文产生较晚，李霖灿先生认为“明成化可以说是音字的上限”⁷，方国瑜先生看到的最早的哥巴文石刻刻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认为哥巴文的产生是在“十三世纪初年”⁸。我们将乾隆八年（1743）《丽江府志略》用汉字记录的 308 个纳西语词与现代纳西语作过比较，发现 260 年音义变化不大⁹。而纳西语和亲属语言的分化，特别是和藏语、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的分化，时代可能相当久远，总不至于晚到元明时代吧。

又黄文所举的亲属语言例证也多是混杂而难有说服力的。如例十九、例二十、例二十一各用一些亲属语言词证明哥巴文  ny、 su、 bia 是汉字“反”的训读，那么这 3 个不同音的词是一个词的分化呢，还是三个不同的具有“反”义的词呢？若是一个词的分化，其语音演变的条件和规律又是什么？若是三个不同的词，黄文并未举出纳西语读 ny、su 的“反”义词的实例，又怎么能证明这些词的存在呢？

三、民族历史文化和字源考证

考证哥巴文的字源，应充分重视哥巴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充分重视纳西族两种自源文字东巴文和哥巴文的内在联系，充分重视哥巴文在经典中的运用情况，如果对这些实际情况考虑不够，而只看字形的相似，就有可能变成与汉字简单地比附。

1、正确估计东巴的汉文水平

黄文说哥巴文借用了 30 多个生僻汉字，如亼（集，例一一二）、丌（下，例一二一）、乚（纠，例一三三）、𠂔（总角，例一三四）、夊（终，例一九一）、𠂔（寡，例二〇六）、厶（肱，例二〇八）、𡿨（沟渠，例二一〇）、𠂔（取，例二一二）、𠂔（杀，《说文·我部》：“我，……从戈从𠂔。𠂔，或说古垂字，一曰古杀字。”例二四五）等。并说：“由此可见，哥巴字的创制者不但采用汉字为基础，而且还以汉文重要字书《说文》为参考，选取了较为生僻的汉字古字古训作为造字原型。”这可能是高估了东巴的汉文水平。东巴是纳西族民间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掌握东巴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农民，绝大多数并不具备高深的汉文化特别是古文字知识。李国文先生《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第八部分《各地东巴》收录了丽江、中甸、宁蒗等地 635 个东巴的小传材料，其中只有 16 人有学习过汉文的记载。小学毕业以上的只有和即贵、杨扎史、和志为 3 人，读过初中的只有和即贵、杨扎史 2 人，其余都是“稍习汉文”¹⁰。当然上述材料肯定有不少遗漏，但东巴们的总体汉文水平可见一斑。科举时代学习汉文取得功名的东巴，只有清末巨甸乡巴甸村和文裕 1 人。据说他考取了秀才，“是文秀才武秀才说法不一”，但由于当地文化人的攻讦而被革除了¹¹。这种水平的人在东巴中是凤毛麟角。和即贵先生读过中学，是当代东巴中纳汉兼通、有高深造诣的大师，但据笔者在东巴文化研究所进修期间的观察，其汉文水平也还达不到读懂《说文》，认识古文字的程度。所以，说东巴参考《说文》古字形创制哥巴文是不大可信的。

2、注意东巴文和哥巴文的内在联系

从象形字到假借字，经过符号化、规范化而逐渐变为标音文字，这是自源标音文字发展的通例。东巴文和哥巴文虽然产生时间、流行地域、应用多少有所不同，但作为同一民族同一使用群体（东

巴)用于同一用途(宗教)的两种自源文字,必然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东巴文作为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在记录经典时往往没有逐词记录语言,也不成线性排列,但已有相当数量的假借字。在应用性文献中,假借字可以多到百分之七八十¹²。东巴经中经常会有成段的咒语,为了保证咒语的法力,咒语总是逐字标音的,可以说,咒语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假借字¹³。标音的需要,假借字的大量使用,加上藏文、佛经的影响,哥巴文的产生势在必然,而借用改造东巴文是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之一。例如:

例一三八 ni, 黄文说“显见也是借用汉字‘日’而改形训读或象形训读”。东巴文日作, 音 ni²¹, 也有写作的¹⁴, 与哥巴文形音相合,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借用汉字呢?

例二二四  phuu, 黄文说“显见借用汉字‘北’而改形音读或训读”。纳西语 phuu 并无“北”义, 而东巴文断 phuu⁵⁵作 , 两相比较, 其来源为东巴文更为合理。

例二二五  gæ, 黄文说“显见也是借用汉字‘北’而改形训读”。并举出纳西语 gə ly、xo gv lo 北为证。按东巴文东方作  ni³³ me³³ thv³³, 直译为太阳出; 西方作  ni³³ me³³ gv²¹, 直译为太阳落; 南方作  i³³ tsɿ³³ mu²¹、mu³³ ly²¹, 为  水字的下半部分, i³³ tsɿ³³ mu²¹ 直译为押赤(昆明古称)下方, mu³³ ly²¹ 直译为下看, 亦即下方之意; 北方作  ho³³ gv³³ lo²¹、gə³³ ly²¹, 为水字的上半部分, ho³³ gv³³ lo²¹ 指四川盐源及雅砻江一带¹⁵, gə³³ ly²¹ 直译为上看, 亦即上方之意。gə、gæ、gv 只是地名、方位名的一部分, 并不是“北”的训读。东巴文夹 gæ²¹作 , 哥巴文  gæ 与其形音的关系十分明显。

例一二  muu, 黄文说“显见借用汉字‘凹’而训读”。纳西语 muu²¹确实有低下义, 但  是来源于东巴文  ga²¹ 高的倒写。东巴文有时用某字的倒写表示与其相反的意义。如将人字倒写作  表示死亡¹⁶,  桶假借作出现, 将其倒置作  表示不出现。 的造字手法与此相同, 并非借用“凹”字。

例一九九  ^{so}, 黄文说“显见借用汉字‘光’而改形训读”。实此字从大秤  ^{so³³} 而来, 大秤又写作  ^{so³³}, 又写作  ^{so³³}, 《纳西象形文字谱》[97]  ^{so³³} 山巔, 白地写作  ^{so³³}, 由  ^{so³³} 再变作哥巴文  ^{so}, 并非借用“光”字。

3、使用经书原典材料研究哥巴文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李霖灿《么些标音文字字典》、洛克《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在收集、整理、研究哥巴文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字典所收的材料也难免有混杂、缺漏、片面、呆板等缺点，因此哥巴文研究的取材，应该把字典和经书原典结合起来。进而言之，要取得哥巴文研究的实质性的进步，必须从字典字形的静态研究，转向哥巴文经典的实际运用情况的动态研究。如哥巴文中有很多同形字符，既读此音，又读彼音，这本是标音文字的大忌，字典上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各地东巴多头造字，字典将不同的标音系统混在一起编排而造成的。如果我们对哥巴文经典先进行专书研究，再进行整个哥巴文的综合研究，那我们对哥巴文的认识肯定要深刻得多。经典中丰富生动的材料，对于哥巴文字源考证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如：

例二三四 **𠂔** ly, 黄文说“显见借用汉字‘中’而训读”。例二二八 **𧈧** ly, 黄文说“显见借用汉字‘虫’而改形训读”。就字形而论, 似也有理。但在哥巴文经典《大祭风·迎请精如神》中, ly 音节或写作 **𠂔** (286、346、347、349、350 页), 或写作 **𠂔** (308、351、353、358 页)¹⁷, **𠂔**、**𠂔** 同为东巴文矛 ly³³ 字, 哥巴文 **𠂔** 来源于东巴文矛应无疑义。同理, **𧈧** ly 也应为 **𠂔** ly³³ 矛之简省。

川字，诸书失载。一份丽江地契中有句作，不得其解。若以汉字比附，似可说源于“川”字。但实际上来源于哥巴文  se。 在白地写作，白地人爱在字上添加类似“人”字的笔画，写作，又写作、。在一本帐本中和同时出现，读 iə⁵⁵se²¹me³³，意为“(钱)给了”。由此可证应读 se。可以说，只在字典里转圈子，不研究原典，是很难想到的。

和𐄢的源流关系的。

作为一种活着的、与原始象形文字并行的标音文字，哥巴文的学术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哥巴文的研究可以说仅仅开了个头。哥巴文产生的时间、过程、原因，哥巴文的字数、字形、结构、字源、流变、字音、字义，哥巴文的地域、人群、文体、时代分布和差异，哥巴文经典的文献学研究，哥巴文经典的专书研究，哥巴文字典的编纂，哥巴文的数据化处理等，都是重要而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愿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哥巴文研究，把哥巴文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附记：本文为2004年11月提交给华东师范大学“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字学会年会的论文，会议期间得知黄振华先生已于2003年7月不幸病逝的消息。黄振华先生是著名的民族古文字专家，笔者素仰其名，可惜未曾谋面便永远失去了当面求教的机会！本文虽与黄先生观点不同，但是黄先生的大作启发了笔者的思考，谨以此文寄托对黄先生的追思和敬意！

¹ 李霖灿《与骆克博士论么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后》、《论么些族“音字”之发生与汉文之关系》，收入《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志武《纳西族的古文字和东巴经类别》，收入《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静生《论纳西哥巴文的性质》，收入《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毛远明《哥巴文性质再认识》，收入《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曹莹《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² 黄振华《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燕京学报》新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³ 参看拙文《丽江黄山乡纳西语汉字祭文译释》，中国音韵学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

⁴ 李霖灿《论么些经典之版本》，《么些研究论文集》101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

⁵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字概览》186、116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壮文声调原标调类，现改作调值。

⁶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字概览》207、225、226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40、2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壮文声调原标调类，《图录》用新壮文，现改作国际音标和调值。

⁷ 李霖灿《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么些研究论文集》78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

⁸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⁹ 参看拙文《乾隆〈丽江府志略·方言〉记略》，收入《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

¹⁰ 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所收东巴总数为笔者统计，其中包括只有口诵经的达巴7人。学过汉文的16人为：阿普晓那（143页）、和开祥（151页）、杨继先（158页）、和即贵（170页）、和协中（172页）、和自强、王绍文（194页）、纽布巴、和四伟（201页）、和绍文、和学志（206页）、杨洪发（207页）、杨扎史（231页）、和灿文（233页）、杨国珍（234页）、和志为（235页）。

¹¹ 李霖灿《论么些族“音字”之发生与汉文之关系》，《么些研究论文集》58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

¹² 参看拙文《纳西东巴形声字假借字音近度研究》、《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收入《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

¹³ 如东巴经《退送是非灾祸·白刃利刀镇压扣古鬼》共9页，后半为4页咒语，整理者曰：“以下都是咒语，无力翻译。”应都是假借字。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3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¹⁴ 如东巴文卜书《算六十花甲年的月大月小》，书中两种写法都有，而以后者居多。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96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¹⁵ 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¹⁶ 东巴经《用六十干支占卜》“有生六个儿女的福分，五个会养大，一个会夭亡”句，用五正一倒六个人字来表示。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99卷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¹⁷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Remarks on the origin of Geba scripts

YU Sui-she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that Geba scripts we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haracter was debated in this article. The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Geba script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al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scripts. The exegesis of the Geba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Geba scripts and the interlink of Geba and Dongba scripts.

Key words: Geba scripts; origin; exegesis

收稿日期: 2004-11-10

作者简介: 喻遂生 (1948—),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教授。